

中国 人 民 大 学 成 立 三 十 周 年 纪 念

校庆科学讨论会 论 文 集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中 国 语 言 文 学 系

1950
1980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校庆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目 录

- 略论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 陈传才 (1)
论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 李永祜 (16)
学习周恩来同志论文艺与社会生活 余 飘 (39)
歌颂、暴露、批评及其他 周忠厚 (57)
 ——学习周恩来、陈毅同志文艺论著的体会
论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反帝思想 阎焕东 (71)
马克思主义鲁迅论的奠基之作 赵遐秋 (93)
 ——重读瞿秋白同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别林斯基论“自然派”文学 张秉真 (126)
试论苏轼在宋代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 成复旺 (139)
也论《圆圆曲》 叶君远 (155)
 ——和姚雪垠先生商榷
试论中国古典叙事诗的源流和发展 肖 驰 (171)
陶渊明家世新考 邓安生 (185)

略论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

陈 传 才

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要求，也是创造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原则，却在十年浩劫时期遭到“四人帮”的篡改和践踏。他们用“彻底扫荡”的荒谬口号取代批判继承的正确观点，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给古典文学遗产的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粉碎“四人帮”以来，思想文化界虽然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对待文学遗产问题，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还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分歧，既涉及到如何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余毒，也关系到如何正确地总结文化革命前的历史经验。本着“百家争鸣”精神，现就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重新加以探讨，以期引起深入的研究。

一、要清除对待文学遗产的“左”的流毒

经历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浩劫，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出现，是有其复杂的思想历史根源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又逐渐抬头。不仅在反右斗争中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还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重大政治运动影响所及，导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一种“左”的观点和思潮：似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

成后，阶级斗争总的来说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越来越尖锐。因此，紧接着五七年反右斗争而来，便是各条战线“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在文学遗产的领域里，随着五八年“厚今薄古”口号的提出，很快地便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既粗暴地贬低了古代优秀作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及其作品的人民性，而且还轻率地提出“民间文学是古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的错误观点；到了六十年代初，这股“左”的思潮又在“上层建筑之一的文艺部门，不能适应我们的经济基础”的理论指导下得到发展，以致把中外文学遗产当作“封、资、修”的黑货，一再加以批判。“四人帮”的“彻底扫荡”论，正是这种“左”的观点和思潮的恶性膨胀。这就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要进一步肃清“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的流毒，亟须联系文化革命前的“左”的思潮，从思想、理论上对“厚今薄古”口号进行拨乱反正。

首先，不应把“厚今薄古”的提法形而上学地应用于文学遗产领域，因为文学遗产的研究对象当然属于古代思想文化的范畴。因此，只能提出“古为今用”的要求，而不应该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况且在古今文化的关系上，用“薄古”、“厚今”作为衡量标准也是错误的。因为“古”的文化中既有精华和有价值的部分，也有糟粕、反动的部分；同样，在“今”的文化中，难道不是也有优劣、善恶、美丑之分吗？！要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也不能采取这种违背科学规律的“厚今薄古”方针和做法，重要的应该如列宁所说，善于吸收和改造自古以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以便根据新的时代生活的要求，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列宁在同卢那察尔斯基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了新、旧艺术的竞争问题，指出如果新的艺术不成熟、不强大的话，要想取代旧的艺术，那是很困难和缓慢的；而要促使新艺术的成熟、强大，就必须以旧艺术中的真正美的东西作为前提和基础。列宁这个充满辩证法的见解，在他同蔡特金的谈话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即使美术品是‘旧’的，我们也应当保留它，把它作为一个范

例，推陈出新。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我们就要敞开真正美的东西，抛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是因为‘这是新的’，就要象崇拜神一样来崇拜新的东西呢？那是荒谬的，绝顶荒谬的！”^①实际上，有些“新的东西”恰恰是以新的形式掩盖旧的思想内容，正如鲁迅曾经指出那样：腐败的思想，既能够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可见，如果用“厚今薄古”的观点看待古典文学遗产，势必否定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取消对文学遗产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

其次，“厚今薄古”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对待遗产的理论、政策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以形象再现社会生活的文艺，同哲学等意识形态一样，并不是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全部变更，只是其中某些部分消亡了，另一些部分被保留下来，供后人学习和借鉴，从而发展了新的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内容虽与过去时代迥然不同，但也并非与过去时代的文学绝缘。因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都曾经历由上升时期到反动没落时期的演变。在上升时期，它们创造了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进步文化；即使在没落反动时期，也不乏有同情人民的作家，他们也从当时的特殊环境出发，为古代优秀文化留下宝贵的东西。正如鲁迅所说，“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选取。”^②特别是对以往进步文学传统及其艺术形式的推陈出新，更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所以，“厚今薄古”的口号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遗产的理论、政策相悖离的。

第三，之所以强调要对“厚今薄古”口号进行拨乱反正，不仅因为这个口号是形而上学的，更重要的还因为它代表了“左”的倾

① 蔡特金《回忆列宁》，转引自《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911页。

② 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6卷20页。

向。这种“左”的观点和思潮总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和地主、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绝对化，认为对立双方没有任何联系，似乎社会从来都是分裂的，结果便形成一系列僵死的概念：被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是进步的革命的，而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总是落后的反动的；无产阶级和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从来都是高的，没有也不可能以任何形式从剥削阶级接受或继承任何东西。谁要是肯定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有进步部分，主张对这些有价值的优秀文学遗产批判地继承，就要被斥之为“复辟、倒退”制造舆论。因此，每当运动一来，就毫不例外地要从所谓“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对中外文学遗产进行冲击，对人类的精神文明进行摧残。并在人们的思想中，造成“古的东西搞多了，就有可能出问题”的“恐右病”。正是基于这种教训和流毒，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为着肃清“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恶劣影响，必须深挖产生“厚今厚古”的“左”的思潮的思想历史根源，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古典文学工作的发展步伐。应该说，这是当前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不应该偏狭地理解“精华”与“糟粕”

古典文学遗产，是前人从彼时彼地的生活出发所进行的艺术创造，即使是优秀作家的作品，也免不了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因此，对文学遗产必须批判地继承和改造，否则，就会因袭传统，全盘照搬，就不能达到推陈出新、创造和发展新文学的要求。这是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能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阶级，她比其他阶级更能珍视人类文学发展中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更能以科学的态度对遗产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既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既吸取有益的营养又摈弃腐朽的糟粕，以便从新的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出发，大胆地革新和创造，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崭新文艺而努力。所以，无

产阶级不但是人类优秀文学遗产的最好继承者，同时也是最富于创新精神的批判者和建设者。然而，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多年以来，我们在批判继承遗产的过程中，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吸取民主性精华，剔除封建性糟粕”的标准，常常作了偏狭的理解和运用，以致把许多本来可以借鉴和改造的优秀文学遗产加以贬斥或抹杀。这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首先，在古典文学遗产思想内容的批判继承上，革命导师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①，把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与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文化”^②区别开来。这是因为，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思想内容必须加以区分，才能辨别哪些是优秀的人民文化，哪些是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文化。然而，革命导师也还一再强调，对“两种文化”的区分不能简单、机械，必须既联系又区别地看待它们，对它们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这样才利于我们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按事物的本性来看，文艺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认识现象。所以，一方面，它在认识和再现社会生活时，既体现了不同社会阶级地位作家的不同观点，又反映了不同作家对客观事物真理性认识的差异；另一方面，它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再现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而艺术思维所达到的程度及其社会作用，又总是与作家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艺术素养及所采取的艺术形式密切相关。于是，在过去时代文学遗产的思想内容中，不仅打上了“民主性”或“封建性”的阶级烙印，而且还具有真理与谬误、美与丑，即真实性和艺术性方面的差异。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不仅在不同阶级、阶层的作家中情况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6页。

各特殊；就是同属于优秀的人民文化中间，民间作者和文人作家、剥削阶级进步作家在上升时期的创作与在没落时期的创作，以及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家的作品，情况也是极其复杂的。从而形成在古典文学遗产中，多少带有“民主性”内容的作品，未必都具有深刻揭示生活真理的认识价值和审美魅力；而在具有“封建性”内容的作品中，也不全是谬误和丑的东西，有的还含有某些对社会历史有认识价值的真理性“颗粒”，以及可供借鉴的艺术表现方法。正因为古典文学遗产的状况如此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在鉴别其思想内容的进步或反动、真理或谬误、美或丑的时候，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既不能把多少带有民主性“精华”的作品范围限制得很狭窄；也不能把那些反映“封建性”内容、却具有一定认识和艺术价值的作品统统归入“糟粕”之列。事实上，毛泽东同志抗战时期提出对古代文化遗产区分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是有其现实的针对性的。那时国民党反动派不遗余力地宣扬封建文化，提倡尊孔谈经，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从政治上区分“精华”和“糟粕”，反对古代文化中的腐朽的东西。但是，这个从政治上评价文学遗产的概括性的标准，并不能代替我们对整个文学遗产的具体、全面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本人在批判、吸收和改造遗产中，就没有把“精华”与“糟粕”理解得那么狭窄，更没有把“民主性”与“封建性”作简单、绝对化的划分，尤其善于从那些“封建性”作品中批判地吸取有认识价值的思想材料和艺术营养，所以他的著作和作品才能做到古今贯通，具有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内容。同样，鲁迅、郭沫若等一代宗师的作品所以才华横溢、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也是他们善于熔古今于一炉的结果。可见，如果我们在古典文学遗产思想内容的批判继承上，对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采取简单、绝对化的区分，就不能多方面地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材料和艺术营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此，我们必须吸取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以便对古典文学遗产的思想内容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在古典文学遗产思想内容的批判继承上，由于偏狭地理解从政治上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结果常常把对作品内容的具体分析撇在一边，而主要去考察作家的身世和政治态度，因而便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比如在南北朝时代，曾经给当时玄言诗盛行的诗坛注进一股清新诗风的谢灵运，由于他是门阀贵族的后裔，曾反对执政的、出身比较寒微的刘宋王族，结果有人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认为刘宋政权在当时代表进步势力，所以便从政治上否定了谢灵运，其作品也被排斥于民主性“精华”之外，甚至归入封建性“糟粕”之列。类似的情况还有宋代的苏轼，这个在宋词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豪放派”代表词家，也因为曾经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有人就以此贬低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极不公允的。诚然，作品对人民的态度同作家的政治态度是有联系的，但却不等同于作家的政治态度。因为前者是指作品的客观效果是否反映了人民的某种思想感情，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它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复杂得多；后者则主要指作家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中的表现，而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即使代表革新一方，也并非完全代表人民。何况文学不是政治的简单图解，谢灵运和苏轼的作品也很少直接反映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即使在苏轼一些涉及王安石变法的诗篇中，也仍表现了作品内容与人民思想感情的某些联系，因为王安石的新法在实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病，给人民带来了某些损害，这倒说明苏轼是同情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只不过他与王安石的政治见解不同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对古典作品内容的进步或反动、精华或糟粕、真理或谬误、美或丑的评价，主要的不应纠缠作家的立场和政治态度，而应着眼于作品内容是否与当时人民的思想感情相联系。只要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作了比较真实的反映，就具有进步意义和认识价值，就应该加以肯定，并在批判继承中进行吸取和改造。

经验教训之二，就是在古典文学遗产思想内容的分析、评价

上，常常离开作品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及其艺术形式所表现的独特内容，总是从作品“是否广阔、深刻地反映社会阶级矛盾，表现了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这个仅适用于一部分优秀作品的标准出发。于是，凡不符合这个政治“框框”的要求，不管在人民中间怎样千古流传的佳作，都将受到贬斥或抹杀。比如多年来人们对宋代“婉约派”的词作的贬斥，就是突出一例。如所周知，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经历了由秦观到李清照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受到特定时代环境和个人遭遇的限制，造成秦观和李清照前期的词作所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特别是秦观的词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和生活描写，这当然是客观存在的缺陷。然而，从整个“婉约派”给后人留下的一些优秀词作看来，显然是具有其独特内容和艺术魅力的。它们善于通过富于独创性的艺术意境，表达自己感情的歌唱，委婉曲折地表现了人民的某种思想感情，以及对祖国山川景物自然美的热爱，因而其思想内容的主流是必须充分肯定的。特别是李清照后期的一些词作，在真切表现个人生活的不幸的同时，蕴含着那个时代的辛酸和国家衰落的沉痛，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所以后人才能通过生活的切身感受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象“婉约派”这种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词作，虽没有广阔、深刻地反映社会阶级矛盾，表现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但它却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的某种思想和热爱祖国的情怀。这恰好说明，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其思想内容是具有不同的特点的。怎么能够用一个简单、划一的政治“框框”去衡量具有不同思想内容特点的作品呢！退一步说，即使象“婉约派”这样的作品政治上不算“上乘”，但它毕竟是人民所喜爱的优秀作品中的一种，也是不应贬斥的。

由此可见，对古典文学遗产思想内容的批判继承，必须从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和作品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如果用一个简单、划一的政治标准去生搬硬套，就必然歪曲优秀文学遗产的真实面貌，抹杀丰富复杂进步内容，结果反而达不到“吸取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封建性的糟粕”的目的。

其次，在古典文学遗产艺术形式方面的批判继承上，革命导师强调应当把优美的古代艺术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指出：“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①因此，批判地吸取古典文学遗产中的艺术营养，也是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条件。因为文学的特性是通过语言艺术形象去反映社会生活的，它要求有美感，能动人，富有艺术性。文学作品如果缺乏艺术性，即使思想性再高，也不能为人们所感动，就不成其为真正的文学。古典作品所以能流传下来，同这种感人、精湛的艺术性密切相关。我国古代许多诗人和作家，毕生从事文艺创作，在艺术上造诣很深，富于独创性。所以，艺术形式既受思想内容制约和影响，又有着相对独立性，具有单独存在的价值。多年来，由于我国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不断滋长教条主义的“左”的倾向，不注意作品的艺术性，一味用简单的政治评论取代文艺批评，因而影响对古典文学遗产艺术形式的批判继承，致使许多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由于思想内容上存在着“封建性”的东西，而遭到长期禁锢。例如，谁若提出从李煜词中吸取艺术营养，就要被斥之为混淆“精华”和“糟粕”的“超阶级”艺术观。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也必须重新进行探讨。

诚然，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里反映的文学作品，当然要打上一定阶级的烙印。但是，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远比这个复杂得多。艺术形式或艺术性，是指作家怎样通过艺术手法或技巧去反映社会生活，因此决不能笼统都说成是有阶级性的。比如，把社会生活中某一客观事物描写逼真，这是艺术技巧问题。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作家逼真地写出来的东西，在无产阶级看来，依然可以认为是很逼真的，至于这种逼真受什么思想支配，那是另一回事，不属于艺术形式的问题。任何阶级都有一些艺术造诣很高的作家，这是由于他们下功夫观察、体验生活，又善于借助一定的独特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2页，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形式反映生活的结果。而且还要看到，在剥削阶级的作家中，有的政治上极端反动，然而在艺术技巧方面却表现出过人的才能。列宁在《一本有才气的书》里，提到了一个“忿恨得几乎要发疯的白卫分子”阿尔卡季·阿威尔岑柯，“以惊人的才华刻划了旧俄罗斯的代表人物——生活优裕、饱食终日的地主和工厂主的感受和情绪”，指出他对所熟悉的情况“描写十分逼真”。于是列宁写道：“在我看来，有几篇小说值得转载。应该奖励有才气的人。”^①当然，列宁是在深刻揭露了他的作品的反动性的同时，从“应该奖励有才气的人”这个角度提到他的。但列宁所讲的艺术“才气”却是值得重视的。所谓才气，指的就是作家描写客观事物的才能和技巧。这种能力是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是各个阶级所共同使用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作家所积贮的这种艺术能力，对无产阶级仍然有用。所以，在艺术性之中，除了渗透作者思想感情的那部分外，还存在着有相对独立价值的纯技术性的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从那些带有“封建性”内容、而艺术技巧较高的作品中，吸取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有用的艺术营养呢？我们常常读到古代这样一类抒情诗，尽管内容比较消极，但诗的技巧却深深地吸引我们；我们也常常发现，现代有些诗人和作家在成名前所受的艺术熏陶中，就曾从一些内容贫乏、技巧高超的作品中获得某种艺术素养，再加上他们长期、艰苦的艺术实践，而取得了一定成就，形成新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伟大文学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于象俞万春《荡寇志》这样反动的作品，也指出其艺术性仍然有可取之处。他说：“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可见，鲁迅也不因其作品内容反动而忽视其艺术技巧的研究和吸取。

总之，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多年以来，谁要是这样去分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02—103页。

析研究古典文学遗产的艺术性，就必然被当作“超阶级艺术观”、“资产阶级艺术至上主义”而遭到批判。按照那些批判者的意见，各个阶级只能有各个阶级自己的美，而不存在某种共同美。地主阶级认为美的、有艺术性的东西，无产阶级不能认为美的、有艺术性的。比如古诗中一些写山水、田园、离愁别恨、爱情相思一类的诗，只能是封建资产阶级文人所欣赏的美；如果我们也去欣赏，说它怎么美，那就是宣扬“阶级调和”论。所以，尽管这类古诗艺术性很高，很有美感魅力，但却很少有人去研究，更不敢从中吸取有用的艺术养料了。这个问题在六十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来讨论过，但终究无法讨论下去。到了“四人帮”十年浩劫时期，这个问题更成了谁也不能触犯的禁区。不仅古代那些优美的山水、田园、爱情诗遭到否定，就连杜甫这个为历代所推崇的“诗圣”的作品也被打入冷宫，因为他的作品也有“封建性”的成份。尽管这样，人民群众还是喜爱古代这些作家所创造的艺术美的。如同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一年曾经说过的那样：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之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①这就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强调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而不懂得各个阶级有共同美的人，是无法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中高超、精湛的艺术形式的。

由此可见，为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迅速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不仅要重视对文艺遗产思想内容的批判继承，同时也必须注重对文艺遗产的艺术形式的批判继承。当然，我们是坚持政治和艺术相统一的，首先必须重视那些具有进步的政治内容和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作品，这是取法乎上的意思；同时，也不可忽视那些政治思想内容虽有缺陷，而艺术造诣较高的作品，以便多方面地吸取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有用的艺术养料。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学习高尔基和鲁迅的榜样。高尔基既肯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作为文学家的艺术天才，又尖锐地批判了他们作品中的反动

① 转引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说教；他既从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吸取创作营养，又克服其中所包含的毒素，指出它“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因为它“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出路”。^① 鲁迅不仅从中外文学遗产中取其精英，而且旁涉其他姐妹艺术。他是我国古典小说史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又是我国古典小说优秀传统和艺术技巧的最好继承者和革新者，所以才能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新文艺的伟大开拓者。

总之，只要我们在对待古典文学遗产的问题上，不把毛泽东同志关于“精华”与“糟粕”的区分标准当作教条和“框框”，并在艺术实践中正确地处理好批判继承与革新、创造的辩证关系，我们就一定能够批判地吸取和改造文学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艺术营养，使我们在面对新的时代生活的创作中，不断有所突破，不断有所建树，从而涌现出更多才华横溢、富有独创精神的诗人和作家。

三、必须正确理解“批判”的科学含义

在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中，如何正确地理解“批判”的科学含义，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列宁在回答“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时指出，那是因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② 这就极其深刻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遗产的批判，并非象我们多年来所盛行的那种“批判”，即根据某种“阶级斗争”需要而进行简单、粗暴地“打倒”；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文化

① 高尔基《论文学》，第134、338页。

② 《青年团底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遗产进行科学地分析和鉴别，并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加以检验，看其哪些对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有借鉴意义的，哪些是消极有害而必须加以摈弃的。正因为多年来我们所盛行的“批判”是违反科学的，所以不但不能从思想上、艺术上区分进步与反动、精华与糟粕、真理与谬误、美与丑，反而使那些反动、腐朽的封建毒素为“四人帮”所继承和发展。因此，要正确理解“批判”的确切含义，亟须认真总结教训，还它以科学的本来面目。

例如多年以来，为了服从某种“阶级斗争”需要，常常不加分析地把那些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作品一概视为反动、腐朽的封建毒素，这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背道而驰的。因为任何民族都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同是表现“帝王将相”的作品，既有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对统治者竭力美化、讴歌，从而散布封建思想毒素的作品；更有一些是对那些在历史上曾起过某种进步作用，或在外族入侵、国家民族危难时表现了爱国思想的“帝王将相”作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再现的作品。而且还必须看到，古代进步作家对历史生活的艺术反映，往往不局限于这些人物本身，而是借此揭示了某种生活真谛，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以描写“才子佳人”为主要对象的《红楼梦》，不正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及其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么！《桃花扇》虽也写了“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但却通过曲折的剧情，铺陈了国家、民族的兴亡，概括了深广的社会内容，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矛盾及其变迁的看法和情感。怎么能够不加分析地认为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作品，都是宣扬反动的封建毒素呢！正是由于人们惯于以“阶级斗争”的需要取代对古典作品的科学分析和鉴别，所以既不可能正确区分进步与反动、精华与糟粕、美与丑，反而常常造成是非颠倒的恶果。

又如多年以来，为了服从“路线斗争”的需要，还把批判继承中的“批判”变成牵强附会的“古今比附”法。当吴晗同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蛮横批判之后，接着便否定了一批为人民所

喜好的传统“清官”戏，并且认为“清官”比赃官还坏，“党内机会主义”比公开的敌人还危险。这种随心所欲的“古今比附”法，正是政治上实用主义在文艺遗产问题上的恶劣表现，它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封建时代，“清官”的出现确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更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鉴别。“清官”戏所以为今天的人民所重视，则是由于这类传统剧目具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力量，而且又是经过进步的艺术工作者从新的现实要求出发加工过的。因此，这种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批判继承，与那种从实用主义的政治需要出发的“古今比附”法，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这就是在“清官”戏问题上，两种不同“批判”所带来的不同结果。

再如多年以来，为了服从“兴无灭资”斗争的需要，甚至连古典作品所描写爱情、友情及所表现的人性美，以及中华民族固有的美德、情感，都一概加以抹煞。这实际上是对人类崇高情感的亵渎，是对历史上形成的精神文明的扼杀。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道德、情感是带有阶级性的。但却不能否认，人类在历史发展中还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崇高情感。这种崇高的感情，一直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继承和发展。怎么能够借口“兴无灭资”而抛弃人类社会的美好事物呢！由于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而是从某种教条主义的政治偏见出发，因此必然割断历史，拒绝继承和发扬过去时代的精神文明；同时更不可能遵循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克服阶级社会里人们道德、情感的局限，把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美好品德提高到新的境界。

历史的经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认为，“批判”的科学含义，至少应包括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打倒，而是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